

访谈 | 马岳
达纽

中国民主季刊

第2卷 第3期
2024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自由独裁政体” 与香港民主运动的 命运



马岳



达纽

编按：香港的政治体制是“有自由无民主”吗？中国政府是否希望香港一直维持“自由独裁政体”？“一国两制”有可能不被北京政权摧毁吗？香港的政治特征如何影响了它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哪些阶段，其现状和前景如何？经济和阶级因素如何影响了中港关系？2020年《国安法》之后香港局势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对香港的研究、理解和倡导工作？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正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的香港博士候选人达纽（笔名），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马岳进行了以下访谈。马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香港选举、政府、政党及议会发展、民主化、政治经济学及东欧转型政治。

达纽（以下简称纽）：谢谢马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问您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您如何总结过去30年香港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可以分几个阶段呢？

马岳（以下简称马）：我想其实有不同的分法。首先1980年代是一个初

始的阶段，这是一个很体制外的阶段，民主派还是一个压力团体式的运动，比如争取八八直选、争取民主基本法、都是体制外的社会动员，而地方选举、区议会选举等等，开始有一些比较粗糙的政党组织模式。

到 1990 年代，其实都是一个议会的争取。即是说引入直选后，希望可以透过议会政治、透过选举推动到民主。但是 1997 后有个大的变化，因为选举制度的改变，民主派开始明白了：其实在议会中他们会长期是一个少数派，因而在行政主导的环境下要影响政府政策会有很大的局限。

2003 年“七一”针对 23 条的抗议，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社会动员是史无前例的。另外，本来 1997 至 2003 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市民的关注多数时候都在民生问题上，但是七一之后普选的议题被提上前台。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也改变了，干预变多了，开始担心民主派会用普选的议题来增加影响力。接着的十年八载都是维持着这样的状态——主流民主派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以便和中央讨论民主进程，希望他们支持双普选。

但是大约 2006-2008 年开始，香港的社会出现了变化。第一，在民主没什么进展的情况下，开始有激进化的趋势。第二，产生了年轻一代的大量活动人士。无论是他们搞一些比较后物质主义的运动，还是对传统上一代民主运动的各种议题或形式都开始不满，从 2008 年开始就一直有激进化的趋势。由五区公投、反国教运动、占中、“反送中”运动等等，对抗性越来越大，中港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占中、“反送中”运动争取不到任何东西，2016 年旺角的骚乱之后，有一段时间运动陷于低潮，直到 2019 年的反送中抗议的大爆发。反送中运动根本地改变了整个局面，而到 2020 年国安

法实施之后，很多民主化的寄望差不多在短期之内都没有了。

纽：在反送中之前，您在一本谈及功能组别、港式法团主义的书里谈到，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的不同政策的产出，其实是由业界利益主导。如果回看当时对于香港政治环境、政治体制的理解，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呢？

马：我想港式法团主义的框架一直都是这样，其他学者也用过类似的概念。就是说中央由 1980 年代开始，对港政策一个重要的优先考虑，就是要笼络工商界，维系资本家的信心，以及吸纳不同的商界和专业界别的精英。维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成为管治联盟的一部分，尤其是最初在过渡期的时候，中央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相信一直到 2018-2019 年都没有改变。让工商界知道回归之后他们不会被忽略，香港是不会变成共党的。另外，得到工商界持续的支持也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利商的政策。(1997 后) 整个政制的安排，无论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功能组别，其实都是照顾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有代表。但是这件事反过来给特区政府带来了合法性 (legitimacy) 的问题。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是太过保障了工商界的利益。而且 1997 后时势不同了，市民的期望改变了，1997 前有效的东西，未必在 1997 后仍然有效。虽然有工商界对香港政府的施政上的掣肘、政策的倾斜、利益的争夺，还有因为功能组别和选举制度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中央觉得保障工商界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如果 (全面推行立法会) 直选就有可能难以保障工商界的利益，这一直都是他们面对普选的一个考虑。

但即使在 2019 年之前，这件事就开始有了慢慢的变化。中央开始觉得商界不是真的都能依靠的。有学者的说法是，中资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升级，于是香港的资本家实际上的影响力是下降的。其中一个关键当然

是 2012 年的时候，不少本地资本家不支持梁振英，坚持继续要支持唐英年。其实在 2019 年之前本地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在减退，2019 年之后在国安法时代更是由于直接管治，商界对本地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减退了很多。

纽：可不可以说，由 1997 年前开始建立、1997 年后开始发挥作用的工商政治力量，到了 2020 年国安法实施之后就瓦解了？

马：可能不是瓦解。香港商界本身对整个香港经济的影响力之前就已经在下降。因为中资越来越大，香港越来越依赖中国。香港公司自己在内地的生意机会愈来愈依赖北京，他们不敢说不，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弱，这是其一。其二，中央经过不少事件之后，对香港商界信任或依赖的程度都下降了。以往香港的资本家很重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到了 2020 年，香港的资本家很明显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是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希望香港一直维持一个所谓 liberal autocracy，就是自由独裁政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治以及个人自由等各种自由，以及苹果日报、反对派可以存在，等等，中央希望一直保持，主要做给西方看的，但共产党不希望香港有真正的全面的民主。一直到《国安法》之前，中央都希望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环境，大家可以放心做生意，而全面直选就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国安法之后明显就改变了，维护国际形象因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在意的，但是它的国际形象已经不太行了。

纽：国家 / 政府与商业的关系发生改变后，会不会影响到民主运动的形式和面貌呢？

马：现在香港，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民主运动了。在一段时间里，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不同阶级会就争取民主而结盟，这件事在香港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也似乎很少有期望。商界似乎没有很大的、特别的动力来支持民主。从民主理论的角度，似乎香港民主派应该去找资本家或者中产阶级，跟资本结盟来支持民主。但是这个结盟几十年来都没有过，就是说资本家一直都是不赞成民主的。这个问题上，他们跟中国政府才是联盟的关系。

纽：我想到 2019 年年末之后，不少人发动分别黄蓝店的手法，可不可以把将不同商户、不同企业分黄蓝的做法，放进政商关系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一个假设的问题是，在香港的资本家对于特区政府仍然紧要的时候，民主运动是不是可以笼络香港的资本家，和他们结盟去争取民主？

马：2019 年的经验是，所谓黄色经济圈很多都是小商人、个体户。我不知道有什么大的公司集团真的是“黄圈”的一份子。关键是，2019 年的时候，去哪里能找到大资本家去支持民主呢？你说有没有资本家——除了黎智英——走出来支持民主呢？最多是李嘉诚那些人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或者不会很努力去支持政府。但是他们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支持民主的一员呢？我认为 2019 年并没有看到。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香港资本家支持民主这回事。

纽：您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很难有一个所谓的阶级结盟，会不会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呢？反送中后期所出现的那些所谓行业行动主义 (Professional Activism)，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阶级结盟呢？即不同阶级的示威者，无论你是蓝领、白领、在大企业上班或者是一个公务员，大家都会为了民主去投身到运动中。

马：如果真的用阶级分析的话，蓝领、白领专业人士和资本家，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不一样的。因为无论是专业人士、蓝领、白领，他们都是普通打工仔。一人一票对他们而言，都是有利的，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否支持民主。专业人士很多都抱持自由价值 (Liberal values)。另外有很多的专业，在 2019 年前后有很多的变化，如法律界、社工界、教师等等。职业的逻辑、原则精神，如果没有了自由民主的话，其实是可以破损得很快的。

但是资本家的利益有一点不同。因为香港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资本家都是非常受保护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相当大的政治上的特权。于是在 1980 年代过渡期，他们很担心普选会令他们失去某些特权。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他们目的都是想保留自己政治上的特权。二三十年来，他们的这个本质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尤其是 2000 年之后，很多的香港商界的内地生意比香港生意更重要，他们更加依赖中国政府，更不会得罪中国政府。

纽：这些话题，您的著作都曾讨论过。那么在经历了反送中运动之后，很多东西都开始不适用或者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反送中运动基本上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分水岭。您如何看反送中运动在民主运动中的位置呢？

马：严格来说，反送中运动不是一个民主运动。西方传媒可能很简单地说 2019 年是为民主而抗争，但是就五大诉求而言，只有最后一个是讲普选的。其实如果港府一早撤回（修例），或者不去告人告得那么厉害的话，我想整个运动是不会维持这么长时间的。

但是后续运动就对香港整个民主运动影响很大了。因为那是中央政府对治

港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就和我刚才说的 liberal autocracy 关系很大了。中央要容许香港充分的自由，包括反对派的自由，容许部分的民主选举，但是又不给反对派过半数，不能够全面直选，害怕直选会让反对派赢了特首的位置。中央希望维持稳定，又希望保护工商界的利益，这件事在二三十年内都不是很成功的。但是到 2019 年，他们很明显觉得政权受到了威胁，于是就觉得有必要用国安法来改变，比如反对派被消灭，公民社会里很多大的联盟都不能够再存在，原来的 game plan 就变了，努力维持自由香港的形象的计划就放弃了。根据我的说法，北京要先稳定了政权，维持了权力，其他的以后再想。所以我想反送中运动是一个 game(博弈)。

我去年在中研院的研讨会上讲，我们对香港政治发展的理解可能需要一个新的 paradigm (范式) 了。因为二三十年旧有的范式是 liberal autocracy，就是说研究的范围可能都是说香港有充分的自由。但 2020 年之后，中央对港政策变了，香港整个社会状况以及在西方眼中的状态都变了，旧的理解框架未必还能够适用了。

纽：如果在新冠疫情之后，整个中央对港的政策已经变了，他们不再去追求一个自由专制的政体了，您会怎样形容现在香港的政体呢？用比较政治学的术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威权政体呢？

马：现在香港日常的生活自由，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治上反对的自由在这几年就差不多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专制吗？Sort of (大概是)。

还有一点，过往二三十年来，立法机关的选举，其实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是

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他们还是挺重视民意的，如果觉得有些东西民意反对，可能会被传媒批评，可能会令西方国家（对香港的）印象不好，那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去做。或者，如果做某件事会因为不符合民意而在选举时让民主派得利，那就不做。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不存在了，至少比以前大幅地减退了。现在很多政策都没有以前那样的民意讨论，这是整个政治状况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纽：当传媒的力量弱了，议会没有反对派作为一个民意指标，无法为市民发声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测政府会比以前更不在乎民意吗？

马：可以这么说。换句话说，政府对民意的掌握是会变差的。因为以往任何政策，有任何的问题时，反对派都会冲出来的，苹果日报都会骂一大轮。无论是真是假，他们都会小心一点、在意一点。现在，反对渠道都没有了，民间的批评少了，他们很多政策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发现的机制比以前差，而且一定更慢了。

纽：关于香港人的自由，当不涉及到政权时，香港人是不是仍然有反对的自由呢？比如最近的垃圾征费政策，虽然没有了反对派或者自由传媒去反映相反的民意，但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会后实施的日期。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政府要去适应民意的现象呢？

马：其实这件事并不成功，垃圾征费政策本可以早点解决。如果是以前的话，香港政府会更早去撤回政策。但现在，延期的原因是这件事不是很重要，没有很高的优先性（priority），不是很政治性的东西。保守阵营可能都觉得这件事是不太好的，于是他们是可以让步的。

但是很多东西，如社工注册局改制，我不相信民意会赞成的。在以前的民意环境里，是不容易通过的，譬如会有上街的反对，社会动员的反对。但是现在，你会见到大的 NGO 走出来纷纷支持政府，民间动员不到什么反对的力量。

纽：2020 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主运动的前路是怎样呢？有没有一些机遇或限制呢？或者已经是完全没有可能了呢？

马：短期内看不到有什么大的机遇，如果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因为通常民主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动员。那由上而下的改革，一定要北京对港政策改变，短期内看不到机会。而由下而上的动员，短期内的话，香港走了很多人，包括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都解散了，动员是极其困难的。

纽：一个关心香港民主、香港自由的人，在国安法之后，应该怎样理解自己身处的地方呢？怎样继续留在香港呢？

马：我想不同的人对自己的处境理解不同，做的事情也不同。但有一点是有趣的，就是民意没有很大的改变。我的意思是，反对的声音或者行动是消失了，但现实上，我不觉得政府在争取民意支持上有很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看民意的调查（当然民意调查大幅地减少），是不是很多人对政府很正面呢？不是。特区政府自己也知道。当然官方有一套自己的论述。如果从民主化或者独裁化（autocratization）的角度来说，其实香港只是过了三四年。三四年是很短的时间，未来会怎样发展，我暂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

纽：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比如在今天的香港，政治学的研究是否只剩下关心政府施政、政府管治呢？

马：我觉得不是。香港政治研究需要有范式转换，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如果你说政治是选举、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都是我做了很多年的范围，2021年之后我没怎么再做了。是不是不可以做呢？不是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做 authoritarian elections 或 authoritarian legislature（威权体制下的选举或议会），香港的选举或者议会其实都是可以研究的。新时代的议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这是可以研究的。我自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做，但年轻一代其实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

纽：您有学术文章讨论区议会可以怎样帮忙做一些基层和草根的改革。是不是在 2024 年的香港，类似这种的研究已经不可行了呢？

马：那个主题没有了，地区政治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另外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在研究，当现在没有区议会选举的情况下，区议会选举的状况已经跟以前不同，没有了互助委員會（以往遍布香港的居民互助组织）的时候，地区上的民生关注组是什么角色呢？这是个问得很好的问题，这是可以做的。还有很多的可以去发掘，譬如说公民社会在做什么，市民在想什么，这三四年里面的民意是怎样变化，人们的思考模式，留下来的人是怎样变化，等等。

其实有些研究，当你离开香港之后是很难做的。离开了的和在香港的人对香港的社会现状的观察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问的问题也会很不一样。在

很多层面上，我不觉得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不是说哪些研究不可以，一旦做的话就会拘捕你，或者会叫你不要做。而是说，社会变了，政治环境变了，还有就是公共资讯少了，大家对那个社会状况的敏锐程度变了，这会是一个新的阶段的挑战。

纽：如果让您尝试划分一下留在香港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和不在香港的人，他们的问题意识大概会有什么不同呢？

马：这是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关于民情的方面，在香港的人怎么想，其实是很微妙的，就是说公开表现出来的东西和实际上怎么想的，可能有差别。对海外的人来说，问题可能是，国际传媒出现的资讯，关于香港的多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多得不成比例。

当然我不肯定，在香港的人就真正知道香港的人在想什么，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没有很公开的平台可以有效地讨论。大约十年前，苹果日报仍在，网上的论坛上，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可能隐晦地表达，要去猜的。我想这件事本身需要更多的研究。这是很吊诡的地方，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方法去发掘，问不同的问题，或在不同的、非传统政治的范围（比如流行文化）里去探索。

纽：有些研究方法或研究工具已经用不到了，那么会不会有些工具比以前更有用呢？比如说，网上舆论，现在可能是看连登（LIHKG，香港的网上论坛）的风向，会不会这些平台上的意见对于理解民意更有指标性呢？

马：我想很难讲。因为有不少东西是被审查了，或者不少东西大家已经不

再敢说了。所以方法学上，我觉得那些比较 ethnographic（民族志）的方法会更加紧要。大家以往做研究的时候，香港是很资讯自由的地方，我们会轻易得到很多可以公开观测到的资讯，包括游行人数、民意调查等等。另外传媒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资讯来源，但是现在这堆东西很多都没有了。所以将来可能会用一些更加微观的方法，未必是隐蔽的；但是公开的资讯已经骤减的情况下，研究是更困难的，也是需要更多摸索的。

纽：研究香港有了新的挑战，那么在教学上、教育上有没有相应的适应或者改变呢？

马：我不能代表很多人，因为不同的人，教育经验可能不太一样。以我自己教授政治课程的经验来看，反而不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当然我不会在课堂上叫口号），我想是有两大挑战的。第一就是难以吸引一些比较好的学生来读政治。这和整个社会气氛有关，就是说读政治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我现时也回答不了。第二就是，如果讲香港的现实政治的话，那个 relevance（相关性）是什么？以往教政治学，举个例子说选举，可能很多同学很容易即时看到那件事与他们生活、与社会的相关性，但是现在，就弱了很多，同学们学习的动力、热情会减弱。如果他们很想改善香港的政治状况，那究竟所学的课程有什么相关？

纽：可不可以说在 2020 年后的香港，行动者、研究者、公民社会等等，大家都是各自摸索、寻找新路？

马：很多学科没有那么受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我不觉得有什么影响，不少社会学的研究也未必有很大的影响。政治学会受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政治

实况的变化比较大。香港政治的研究，过往太受比如说选举民主化的主导了。但是我会说有关香港社会的研究，八九成都应该没有影响的。如果你说一些人不再喜欢回答 survey（调查问卷）的问题，我会承认的；但并不是说你出街做 survey 就会被抓。只是调查的有效回复率降低了，那大家就要想怎样解决了。

纽：谢谢马岳教授。

马：感谢你，感谢《中国民主季刊》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中国民主化问题的贡献。